“南斯拉夫实践派”研究述评

■姜海波

【提　要】我国对实践派哲学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译介阶段、反思阶段和展开阶段。目前，对于实践派历史的梳理，关于实践派哲学思想的理论定位，以及重要的概念术语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在实践派哲学思想与南斯拉夫经济学研究的关系、与南斯拉夫自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践派内部的理论差异，以及如何借鉴实践派理论并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等方面尚需继续研究。

【关键词】南斯拉夫实践派　实践哲学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2)03-0024-05

南斯拉夫实践派(以下简称实践派)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它在批判和反思苏联教科书体系的理论运动中异军突起，一跃成为国际学术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实践派群星璀璨，他们因1964年《实践》杂志的刊发而举世闻名。在美国学者罗伯特·科恩等人编辑的《波士顿科学哲学研究丛书》第36卷中，编者选取了一组实践派的文章，称之为“当代社会理论运动中最富创见、最为重要的运动之一的精品”[1]。戈尔曼指出，“实践派”之所以赢得“国际公认”，一是由于他们用人道主义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再评价；另一方面是他们“批判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实践”。[2]弗洛姆、哈贝马斯、博托莫尔、望月清司等著名学者也给予实践派以足够的重视，可以说，实践派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一、关于国内实践派研究的契机和阶段

国内关于实践派哲学思想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译介阶段（1949—1979）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在经济体制上主要是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也主要是沿袭苏联教科书。苏共二十大以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掀起了一场所谓“非斯大林化”的运动，国内理论界需要及时了解和掌握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动态。这期间，《哲学译丛》杂志译介了大量实践派思想的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汇集在《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中。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分裂为“辩证唯物主义派”和“实践派”，前者由拥护反映论的哲学家和一些自然科学家组成，后者由赞成实践、人、异化是马克思本真思想的哲学家组成。争论双方围绕“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异化等问题展开，而这部文集遴选的文章就是这场争论中重要文章。此前，我国还出版了介绍南斯拉夫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参考资料，如《南斯拉夫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等等。值得注意的是，1963年，三联书店还以内部参考资料的形式翻译出版了实践派著名哲学家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这部著作不仅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也包括狄慈根、拉法格、索列尔、梅林、考茨基、卢森堡、阿德勒、希法亭等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要人物，还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布洛赫、列菲弗尔、萨特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这是我国学界通过实践派哲学家的著作首次了解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它还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突破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重要参考资料。另外，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以来，尤其是二战以后，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界都开展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借以反思人类战争行为的灾难性后果，对此，《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第四辑、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关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论争（译文集）》中选取了实践派主要代表人物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日沃基奇等人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简言之，我国这一阶段对实践派的研究主要是翻译和介绍。

2. 反思阶段（1979—1999）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实践派思想研究一时间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前沿问题。当时，我国学者面临着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任务，非常需要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积累的理论经验，尤其是来自社会主义内部的自我反省，而这方面的资料却又相对缺乏。于是，一方面，我国加紧编译实践派哲学家的著述，如1994年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中就包括《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一书，这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译著。该书选编了二十几位实践派哲学家的论文，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主义政治和革命、文化与宗教、官僚制度和自治理论等诸多方面。《哲学译丛》、《哲学研究》、《社会科学动态》等杂志也发表了许多实践派的文章，以及来自各方面的评论文章，如日本学者岩渊庆一、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和施瓦尔茨、英国学者霍夫曼、苏联学者奥伊泽尔曼和波普科夫等人的专题论文。而在苏联学者主编的《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在“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这两部典型著作中，实践派哲学家的观点被认定为“修正主义”加以批判。这样，来自多方面的观点已经摆在我国学者面前，对这些著述的编选本身就标志着我国学者开始对实践派的思想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国内也出现了大量研究著述。在黄楠森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八卷本）和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中，实践派都是作为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分化的重要流派被载入的。我国学者王树人、贾泽林、柴方国、吴平、王逸舟、郑一明、衣俊卿等人都发表过关于实践派的专门论文，从转述到评价、从反思到运用，我国形成了实践派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3. 展开阶段（2000年至今）

党的十四大以后，对实践派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著作和论文相对较少。进入21世纪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学科建制上成为一级学科，其中包含“国外马克思主义”二级学科，因此，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成为学科建设的内在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南斯拉夫实践派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学术团体，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分化和演进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张一兵和胡大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中就将实践派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黄继锋也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专门介绍了实践派。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衣俊卿撰写的《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这两部著作。衣俊卿曾留学南斯拉夫，得到实践派十几位哲学家的亲自指导，因此对实践派的思想有着深厚的造诣。2010年起，衣俊卿组织编译“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第一批共四十本，其中包括实践派的著作八本，目前已出版两本，即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主编的《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与马尔科维奇的《当代的马克思》。《世界哲学》和《求是学刊》杂志也不定期刊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专栏，推出了一系列译文和研究论文。这样，实践派作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一支获得了全面展开研究的契机。

二、关于实践派的哲学思想研究

目前，对实践派哲学思想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实践派的兴衰史。实践派著名哲学家马尔科维奇在《实践——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一书的序言中介绍了实践派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以及实践派的基本哲学观点，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开展了进一步的研究。衣俊卿将实践派的历史分为20世纪50年代批判斯大林主义，形成人本主义立场时期；60年代初人道主义派同辩证唯物主义派进行直接的理论交锋时期；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实践派全面发展的黄金时期；70年代中期以来实践派解体和哲学生活多元化时期。[3]黄继锋分为1945年—1950年代末的形成时期；1960—1974年的黄金时期；1975年以后实践派内部的分化时期。[4]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哲学的研究的对象就是它的历史，然而一种哲学的历史首先离不开产生它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1960年实践派和辩证唯物主义派的讨论会、《实践》杂志的刊行等重大事件，可以相对精确地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刻画实践派的思想历程，对此国内学界基本形成共识。《实践》杂志被查禁后，实践派的著述虽然还在传播，但如衣俊卿所说，“作为一个理论学术团体，实践派的历史已经画上了句号”。[5]目前，随着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坎格尔加等人的相继辞世，实践派已经成为类似康德哲学的一种哲学成为国内研究的对象。

第二，关于实践派的理论定位。实践派哲学思想的直接来源无疑是马克思，它首先立足于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批判，这一点在国内学术界也已经达成共识。王逸舟指出，实践派哲学家们“用犀利无比的笔端，揭露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对人的歪曲，抨击着现实中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努力为更加人道的社会主义廓清道路”，因而显示出“一种与现实条件相对而言的高度超前意识”。[6]衣俊卿指出，“要真正确立以实践为核心的哲学人本主义立场，不仅需要批判斯大林主义，而且必须回头重新评价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7]如何对实践派进行理论定位呢？在衣俊卿看来，实践派“提供了迄今为止关于实践哲学的较为完整的阐发与表述”。[8]彼得洛维奇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和《革命思想》，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和辩证法》，坎格尔加的《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问题》等著作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当代关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最为系统的建构与表述。而张一兵和胡大平认为，“不能简单地将他们的立场概括为实践哲学”，[9]实践派“的逻辑并非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相反，它可能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立场”。[10]由此还引伸出与实践哲学相关的人道主义问题，王树人认为，马克思在哲学中最关注的，不是物质和精神的定义，而是人的解放，因此实践派自身的理论定位无可厚非，“这一切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如此泾渭分明，怎么能同日而语呢？”[11]在我看来，哲学家毕竟不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政治家，他们有独特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表述方法，哲学家的使命是表达人类的希望，而这种希望不是现实中已经出现或接近实现，而是未出现的和待人们去创造的。虽然实践派在理论逻辑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承袭关系，但由于是来自社会主义内部，因此“其讨论的问题域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12]不能简单地将实践派看作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和附庸。

第三，关于实践派的核心概念。哲学体系的建构离不开核心概念，实践派也不例外。贾泽林较早地介绍了实践派的主要哲学思想，他通过实践、异化、人道主义、辩证法等四个主要概念展开的，当时主要是转述。[13]实际上，实践派演绎的重要概念还有自由、自治、革命和社会主义等，这里不能一一论述。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一论断已经得到我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基本认同，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践一直被当作认识论而非本体论概念，实践派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就是“把实践（praxis）同关于实践（practice）的纯认识论范畴区分开来”。[14]对此，衣俊卿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实践派对作为人本主义和本体论范畴的实践内涵的基本阐述”，[15]在庄福龄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史》中，编者认为，实践派“把实践概念看作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钥匙，并赋予它以广泛的意义和本体论的地位”。[16]王逸舟指出，实践派的“实践”概念“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为人们揭示南斯拉夫新哲学同传统社会主义哲学的分野”，[17]因为它既不是作为日常生活和工作意义上的一般性活动，也不是传统哲学意义的实践，而是对现实的选择和超越，由此使实践哲学上升为一种社会批判哲学，它使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使研究对象聚焦在人的存在和发展问题上。

辩证法也是实践派哲学家演绎其哲学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是实践派和辩证唯物主义派分歧的焦点，还是实践派区别卢卡奇思想的标志，因此也是国内研究的一个重点。衣俊卿认为，实践派的基本倾向是“把辩证法同人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18]柴方国认为，实践派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讨论辩证法问题的。实践的辩证法以规范化的实践为基础，以人为中心，突出了以前没有没有被人们注意到的内容，即批判的、人道的内容，强调辩证法必须关注人类，对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加以说明”。[19]贺来通过比较实践派与捷克哲学家科西克对辩证法的理解后发现，他们对辩证法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本性的阐发是惊人一致，而且辩证法的真实根基是“人的存在及其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20]进而言之，辩证法的否定和超越原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实践活动在根本上就具有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本性”，[21]由此，辩证法的理论关怀指向的是人的解放。笔者认为，概念术语之间的结构关系也至为重要，实践派哲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学家们就通过人的概念对异化、革命和辩证法进行了重新理解，通过人的概念实现了这些术语之间特殊意义的链接和重新整合，概念术语和理论体系之间形成了有机的互动。[22]实践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同样面对异化问题，但由于异化发生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也就不可能得出同样的答案。

当然，对于实践派哲学思想的理解也存在着争议。如有的学者认为，实践派“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自然辩证法，这显然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23]还有学者认为，包括实践派在内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24]还有学者认为，当南斯拉夫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以及后来走向混乱和国家解体的过程中，实践派“起了恶劣的思想和舆论作用”，因为实践派的观点“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实质上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抽象的‘人’抽象的‘自由’学说，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25]但是，1968年遍及欧洲的各国的学生运动也波及南斯拉夫，实践派因此受到牵连，实际上，实践派不是也不可能是南斯拉夫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运动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不能归咎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播。

三、关于实践派哲学思想的继续研究

首先，南斯拉夫的经济学研究与实践派哲学思想的关系。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与经济学形成了积极的良性互动，对实践派的研究也应效法这一思路。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翻译了米拉丁·科拉奇和蒂霍米尔·弗拉什卡利奇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分析原理》、乔西奇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著作；2001年还编译出版了霍尔瓦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该书曾获诺贝尔提名奖。霍尔瓦特在书中援引彼得洛维奇、马尔科维奇、弗兰尼茨基等实践派哲学家的思想，运用异化和物化概念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哲学、心理学和道德基础。[26]在当代南斯拉夫学者重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真正能够作为理论资源的、能够融入体系建构的恰恰是实践派的思想，而不是传统的苏联教科书体系。但是该书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将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然而，社会主义已经是一种世界现象，如果不考虑全球规模的社会主义关系，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可能完备的。

其次，实践派内部的理论差异研究。实践派中没有绝对的理论权威，他们由于共同的理论取向和实践态度联结在一起，而不是由于某种理论学说。实际上，实践派内部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见解也存在很大的思想差异，甚至对实践概念的使用和对哲学观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衣俊卿曾坦言，“我们无法详尽地展示实践派哲学家的理论建树的所有方面和不同哲学家之间的差异，而只能揭示实践派哲学家所持的共同的哲学立场和对人与世界的根本问题的一致见解”。[27]由于实践派哲学家们面对的实际环境，以及对环境性质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因而发挥理论的潜在功能时强调不同的侧重点。在某种意义上，理论差异是常态，是理论发展的前提和土壤，反之，理论的生机就停止了，就会蜕化为马克思批判过的“神学”。我国众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而理论发展的走向正蕴含在这些特定的差异之中，因此实践派提供了绝佳的参照系。

再次，实践派的哲学思想与南斯拉夫自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南斯拉夫是把工人自治管理的理论应用于全国规模的唯一国家，实践派也把“自治”看作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唯一能抗衡官僚主义的体制，因而是代替苏联模式的基本道路，同时，实践派哲学家也对南斯拉夫施行的自治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许多人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为由，认为工人自治行不通，这显然不合逻辑。南斯拉夫曾经是二战以后欧洲发展最快的国家，政府的高层人士也毫不讳言“出现过官僚主义集权的缺陷”，[28]某些问题与我国的情况非常接近，这里启示我们的问题是：哲学应该以何种形式介入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实践派的理论仍待挖掘。

最后，如何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派认为，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人道主义哲学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胡思乱想，它也不是“科学的”，而是今后思想的坚实基础，这些理论取向在《资本论》和晚年人类学笔记中都含蓄地保留着。彼得洛维奇说，如果仔细阅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读马克思那些所谓“成熟的”著作，“我们会发现‘被否定的’异化理论不仅含蓄地而且明白地，不仅它的内容而且它的词汇都出现在这些著作里”。[29]考拉奇指出，“从青年时期到生命终止，马克思始终思考和论述作为人的人，始终致力于最充分的、可能的人的本质的定义”。[30]通过对青年马克思是否成熟的回答，实践派确立了自身在“两个马克思”、“认识论断裂”等世界性争论中的理论立场，它既不同于卢卡奇以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又远离原苏联教科书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实践派完成了对马克思整体思想的深刻解读，完整和系统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如果不能对马克思主义做出通透的解读，就容易陷入断章取义和教条式的错误，从而给实践带来极大的危害。实践派在完整和系统解读马克思的基础上介入南斯拉夫的现实生活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南斯拉夫实践派是当代中国理解马克思的、可借鉴的重要建构性理论资源。

除此之外，仍有许多问题待深入解析，如实践派的政治意义是否已经超出哲学意义？实践派的实践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康德、伽达默尔等人代表的实践哲学的内在关系仍待理清，其与实用主义的实践观有何不同等等，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尽管实践派是否真正地创建了一种哲学尚待讨论，但是它的问世的确是二战后南斯拉夫哲学界迄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并且它的影响范围已经远远超出民族国家，在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之间占据重要的理论地位，由此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分化格局和演进历程，尤为重要的和不可忽视的是实践派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史和命运的反思，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设计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直接和深远的参考价值。鉴于此，国内对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思想的研究理应走得更远。

注释

[1] [14] Mihailo Marković, Gejo Petrović, *Praxis: Yugoslav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V; PXXIX.

[2] R·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702页。

[3][5][7][8][15][27] 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77页；第76~77页；第69页；第77页；第82页；第77页。

[4] 黄继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

[6][17] 王逸舟：《人和社会主义——“实践派”的社会批判哲学》，《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2期。

[9][10][12] 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页；第186页；第181页。

[11] 王树人：《从本刊编辑的<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谈起》，《哲学译丛》1980年第1期。

[13] 贾泽林：《南斯拉夫哲学简介（下）》，《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第2期。

[16][23] 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7页；第362页。

[18] 衣俊卿：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页。

[19] 柴方国：《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观点评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年第1期。

[20][21] 贺来：《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第331页。

[22] 姜海波：《南斯拉夫实践派关于人的理论及其当代启示》，《世界哲学》2011年第5期。

[24] 俞思念：《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噪起和消失》，《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7期。

[25] 张守民：《前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实践哲学”及其泛滥的教训》，《高校理论阵线》2010年第1期。

[26] 勃朗科·霍尔瓦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28] 爱德华·卡德尔：《民主与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29]《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第四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7页。

[30] Erich Fromm, *Socialist Humanism: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Doubleday Company, Inc,1965, P5

（作者为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地副教授）

责任编辑　凤　翔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